

理解《每个人都想成为法西斯主义者》

Roger Merryfield

2024-03-02

目录

他为何要写这篇文章?	3
理解微观政治	5
理解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8

他为何要写这篇文章？

首先，我们必须真正理解瓜塔里在这篇论文中想要达成的目标。他并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相结合，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这些理论各自拥有独特的意义体系，或者说他所说的“集体陈述安排”。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意味着需要在两种理论之间做出许多假设，而这些假设并不一定相互兼容。

与试图重复利用旧结构不同，瓜塔里希望建立全新的结构。这种理论构建的方法是瓜塔里在其较短的著作中的显著特点——通过构建新的关系来描述新事物，从而开启对话，而不是局限于现有的理论框架，以便产生新的思想。这并非意味着他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只是“胡编乱造”，而是他试图为新分析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学分析都存在局限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描述的是社会关系在社会层面的情况，而心理学分析描述的是个人或家庭层面的社会关系。例如，他指出分析“革命的快乐”没有意义，但“革命的欲望”是有意义的——他指出这是因为快乐是在欲望被个体化的个人主义主观性之后产生的。换句话说，欲望必须转化为快乐，这种快乐是通过个人主义和异化的视角来表达的。

他提出了所谓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欲望理论，能够分析个体（微观政治）和社会关系（宏观政治）中的本能和政治。顺便一提，为了便于非专业人士理解，当我说“本能”时，可以理解为它与欲望在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有关。这确实与欲望有关，但详细解释不在本视频的讨论范围内。

理解微观政治

在瓜塔里看来，欲望和压抑并非可以独立于社会心理过程之外的事物，而是当这种机制在历史发展上留下印记时，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功能。正如瓜塔里所言：

“成功阉割”的抽象目标，体现了最恶劣的反动神秘化。

嗯，他没有活着看到加速主义者，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无论如何，要理解微观和宏观政治，不能依赖现有的理论框架，而必须直接接触主导力量的政治机器。这些机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资产阶级国家、学术界、家庭，到性别歧视和恐同压力，乃至个体内心的超我或“良心”带来的压迫。这样的翻译更加自然、易懂。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异，他对比了两种与微观政治模型不同的其他方法。

社会学方法，类似于分类法，收集社会信息并试图对其进行组织，区分不同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如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并通过同质特征进行比较，类似于生物学家过去如何对生命形式进行分类。瓜塔里指出，这种方法既放大又缩小了差异，将各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简化为“事物”，而不是认识到欲望在大众规模上的创造性和生产力。这种社会学方法的转变，可以与进化生物学家从比较解剖学（事物）转向深入 DNA 分析的转变相提并论。

他所说的“合成二元论新马克思主义”方法，将群众的革命愿望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语言。因此，它并非直接代表人民的革命愿望，而是将理论、党和个体战士联系起来，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以“工人阶级和党的团结”为名，将他们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表述中。

瓜塔里采用“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这一说法，而非直接提及工人阶级，以突出这里的二元对立。这里有大众的欲望——工人阶级的现实，而将这种欲望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工人阶级的表征。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综合”效应集中在第三种力量——国家的权力上，它将一切引向其主导编码。他提到：

“任何局部的斗争都必须回归到这些超越的第三对象；即使真实的历史揭示出它们本来的面目——即诱饵，就像俄狄浦斯三角关系的阳具对象一样，一切都必须由它们赋予意义。此外，这种二元论及其超越对象构成了军事俄狄浦斯的内核，必须通过政治分析来应对。”

与之相比，欲望的微观政治并非围绕代表大众斗争的权威构建。它并非以单一方式普遍编码。这并不意味着瓜塔里不相信组织或党派活动，而是这些结构产生了不同的“相对主义结构层”，它们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自己的斗争，摆脱了国家代表的二元对立。它不以国家为中心，国家的权力只能被政党所超越，而是以“最多样化的社会群体能够触及的多种目标”为中心，形成了一种更加自然和易于理解的表达。

专注于斗争的多样性而非构建形式化的组织运动，许多复杂的斗争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瓜塔里指出，这正是他认为是 1968 年 5 月初发生的情况：小规模群体的局部欲望表达与因主

导表达和代表形式而无法表达的大规模压抑欲望产生了共鸣。简而言之，由于小规模欲望释放能够打破主导的表征，并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更大的压抑欲望运动，事物得以松散地连接。

不同于一个编码所有这些欲望的单一实体，而是存在一个“欲望的单一多样性”，包含许多复杂层级的系统，这些系统编码、描述、追踪和调节自身——一堆相互连接的欲望机器。它并非围绕一个单一统一目标以等级制度组织，而是由年龄、性别、性取向、种族等不同分类的生产构成，其统一性源自所有这些机器的共同运作。因此，社会主体无需被某种极权主义标准化所代表。实际上，欲望的本质决定了它将偏离这种标准化。

与两个人面对面交谈、存在不同现实隔阂的情况不同，集体表述的安排产生了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不区分意义的流动（符号学）、物质或社会。它们基本上是“一次性连接”的，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瓜塔里进一步阐释：

“在这里，个人、身体区域、符号轨迹乃至连接在各个领域的机器，都可以参与表述。因此，表述的集体倾向将符号流、物质流和社会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远远未达到其可能被纳入理论体系中的程度。”

现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你们中非常聪明的人可能会想，“如果一切都是所谓的集体发声安排，那么瓜塔里现在在做什么，和这个观众交谈呢?!这不正是他批评的那种面对面交流吗?”别担心，他已经解释过了。

无论如何，像瓜塔里本人一样，说话的个人由于个体化而受到限制。他的话语这样的个体表述实际上被主导意义所束缚。实际上，是主体之间的互动能够建立这些联系，通过连接到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集体机器。正如瓜塔里所言：

“唯有主体群能够操控符号流动，颠覆意义，为其他欲望打开语言之门，创造新的现实!”

理解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现在，带着这个想法，他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分析各种社会机器，例如“工业机器、银行机器、军事机器、政治警察机器、国家技术结构、教会等”的相互关系位置时，这些类别之间的区别就会消失。例如，纳粹警察党与斯大林主义警察党如何进行比较。随着分析的深入，就像瓜塔里所写的那样：

“纳粹党并非一成不变，它不仅经历了演变，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其在不同领域的活动，其作用也各不相同。”

他并非认为我们需要对每个细节都过度分析，而是要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要素在不同形式的社会极权主义中构成了连续性。

有多种途径可以探讨这些问题。他认为，现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并解释说，现代形式已经发展出多种方式来捕捉基于地方关系和生产变革的集体欲望。它们的历史与社会横向性紧密相连。实际上，法西斯主义过去使用的机器正在以新的形式不断扩散——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极权化学”，这种化学在社交和个人结构中蔓延，甚至触及罪恶和神经质。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生产群体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这也导致了工业、经济、教育、信息等领域的人类要素日益呈现出分子化趋势。

再次强调，在瓜塔里看来，个体并非直接与他人沟通，而是参与构建一个“超人类器官链”，并与符号链和物质流交织在一起。这种分子化达到了极致，以至于它们能够“释放欲望的原子能量”。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极权模式，都必须“不断优化和缩小它们的镇压工具”。

瓜塔里由此得出结论，要理解构成极权主义的机器，必须关注微观政治斗争。如果不专注于这一点，就会产生抽象和概括，人们就会重新陷入极权主义的领域，镇压力量也会恢复。瓜塔里主要关注一种不会使欲望的来源与其力量分离的理论。因此，为了对抗这种状况，必须持续关注微观层面，因为极权主义不断适应新的社会变革，并不断产生新的概括。以希特勒为例，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他本身并不一定特别，但他的形象通过“梦境、狂热、警察扭曲的行为，甚至在不知情纳粹主义的某些团伙的皮夹克上重复出现。”即使在现代，纳粹主义依然猖獗，如被嵌入到网络上频繁传播的流行阴谋论中。瓜塔里担忧，仅通过社会、历史、政治和精神分析的一般性概括来分析法西斯主义是不够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正在以越来越微观的形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结晶或显现。

通过假装个人在历史中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他们试图让我们相信，在地区暴君和各类官僚的歇斯底里手段或偏执操纵面前，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微观政治学意味着从今往后，我们将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无论其规模大小，包括家庭内部或个人经济领域。

话题有些跑题，但读这篇文章的这一段挺有趣，瓜塔里开始探讨一些非常吸引人的观点，比如法西斯主义的机制如何超越时空，但他没有深入阐述，反而对批评者发起了一通简短的反击。

“多么混乱的层次啊！所有东西都被扔进了同一个袋子……”“必须指出，正是通过在分子和原子层面上进行分析，化学家们后来才成功实现了复杂元素的合成！”“但他们还是会说：这不过是机械式的套话！”“承认吧；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进行比较。再者，争论又有何益？只有那些对我在谈论的微观政治反法西斯斗争感兴趣并感到紧迫性的人，才会继续听我说话。”

啊，这真是太尴尬了，感觉太贴近现实了。

无论如何，社会尤其是大众媒体中持续存在的叙事，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法西斯主义曾一度出现又消失，最终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合力量的美好形象所击败，这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诠释，掩盖了资产阶级直到法西斯主义对自己构成威胁时才不容忍其存在的现实。瓜塔里指出，尽管有部分资产阶级人士对法西斯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其不稳定且能煽动民众欲望，但国际资本主义仍愿意容忍其存在，直到找到其他控制阶级斗争的方法。盟军并非旨在“拯救民主”，而是为了应对一场灾难性的政治失败。这场失败的欲望失控犹如脱缰野马，危险至极，以至于“地球仿佛陷入了世界末日的危机”。

他说，意大利和德国的左翼方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提供对这种欲望释放的替代方案。相比之下，人们常常认为法西斯国家能够在短期内对政治危机作出更直接的回应，这与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无力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些解释未能认识到，法西斯主义通过激发大众的欲望，对资本主义构成了巨大威胁，甚至比十月革命还要严重。这种威胁源于法西斯主义在大众中引发的普遍“死亡本能”。基本上，大众通过回归法西斯领袖、国家和社会，摆脱了他们所厌恶的现实——他们宁愿自我毁灭，也不愿被迫接受现实。然而，这一过程中，法西斯通过其狂热的“表演艺术”重新激发了这种欲望，并形成了一套新的主导价值观，这反而导致了其内部的动荡不安。

瓜塔里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意义源自“爱与死的混合象征，即现在的爱欲与死亡意志合二为一”。纳粹德国对死亡的迷恋达到了极致，甚至对自身的灭亡也着迷——以至于在战争实际上已经失败多年后，它仍然坚持战斗。而斯大林主义则显得更为稳固。

与法西斯主义相比，资本主义试图将工人分解并使其异化，同时激发他们的“欲望潜能”。它将自身理念植入所有社会阶层，彻底重塑个体对世界的认知。资本主义力求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并通过国家机制自我调节，同时试图将冲突控制在经济和地域范围内。而斯大林主义则将党的权力置于军事、警察等机构之上（与法西斯主义不同，两者权力地位相当），过度控制权力机构，并将广大民众置于严密控制之下，包括国际无产阶级。

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在于其无法适应“劳动力分子化”——即资本主义不断侵蚀更小空间的能力。从本质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在控制这种镇压方面的种种失误，导致其他社会机

器逐渐获得更多权力，进而破坏了党内的权力平衡。这迫使政治问题回归到具体议题，使得资本主义得以通过分子化方式渗透进共产党，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崩溃。尽管在写作时它仍存在于像政党、工会等较小的组织中，但它遵循的是较老的社会民主模式，并未考虑到像 1968 年 5 月那样的革命性欲望爆发。

随着斯大林主义竞争的瓦解，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发展新的极权主义形式。它必须应对种族主义、性压抑、身心残疾人士的压迫、监狱、移民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它将压制所有无法纳入经济目标的事物。瓜塔里指出，法西斯主义正试图在试图适应利润经济欲望的任何结构中扎根。

最后总结一下，瓜塔里写道：“总结一下，我认为以下内容非常重要，应该全文保留。”

我们必须彻底摒弃这种简单快捷的公式：“法西斯不会再次得逞。”法西斯已经得逞，并且仍在得逞。它穿过了最紧密的网，不断进化，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与生产力发展不可分割的微观政治经济欲望。法西斯看似来自外部，却能在每个人的欲望核心找到能量。我们必须彻底停止被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的阴险把戏所迷惑，他们竟然惊讶于他们所谓的世界上最民主的军队，竟然毫无预兆地发动了最残酷的法西斯镇压。军事机器本身体现了法西斯的欲望，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托洛茨基的军队、毛泽东的军队和卡斯特罗的军队也不例外：这并不减少他们各自的优点。法西斯就像欲望一样，散布在整个社会领域，分散成一个个片段；它会在某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结晶，取决于力量对比。可以说，法西斯既强大无比，又荒谬地弱小。而它究竟是强大还是弱小，取决于集体安排和主体群体将社会欲望与革命欲望机器连接起来的能力。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Roger Merryfield

理解《每个人都想成为法西斯主义者》

2024-03-02

<https://punishedfelix.com/2024/02/03/everybody-fascist.html>

nightfall.buzz